

第二版

田澍 著

嘉靖革新研究

美刷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田澍 著

嘉靖革新研究

美利坚



北

第二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嘉靖革新研究 / 田澍著. —2 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1-6819-6

I. ①嘉… II. ①田…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12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安芳
责任校对 芦苇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40 千字
定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林延清

在明史研究中，一段时期，学者们对明初和明末往往给予颇多的关注，而对从土木之变开始，直到万历初年的明朝中期史研究则稍显欠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为数不少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明代中期史的探索和研究。在这之中，田澍教授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绩。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嘉靖革新研究》，正是田澍教授有关明代中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它必将对明史的深入开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笔者有幸率先拜读该书校稿，感触良多。

第一，选题新颖，振聋发聩。明朝嘉靖时期历来被诸多学者视为黑暗腐朽的时期，皇帝怠政、吏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这一时期唯一可称道的只是嘉靖初年杨廷和任内阁首辅时对武宗朝弊端的清除。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严重阻碍了学者对嘉靖朝乃至明代中期社会的探讨和研究。田澍教授在著名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剖析大量的文献资料，重新审视了整

个嘉靖时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提出了“嘉靖革新”这一全新的概念，并进行了严谨而有说服力的阐述，将嘉靖革新的时代条件、运作过程及历史作用全面而客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开启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创了嘉靖时期以及明代中期研究的新局面。

第二，不囿成见，勇于创新。衡量一部著作的学术水平，立论富于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嘉靖革新研究》一书在对嘉靖革新阐述的过程中，独到精辟的见解处处可见。这不仅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也使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如对“大礼议”这一重大事件的看法就与主流的观点极不相同。以往有关著述中常将大礼议看作嘉靖皇帝为强化君主专权而进行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不大。而本书则将其视为明代历史转折的一大事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少积极作用。这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皇权转移的必然性事件；二是新旧官僚集团更替的必经阶段；三是其本身就是革新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具体而言，正是大礼议最终实现了皇权的完全转移，使明朝皇位异常更迭而出现的混乱局面趋于有序，并成功地完成了新兴势力取代旧势力的历史性转变，为推行全面革新准备了历史条件。可以说没有大礼议，就不可能有嘉靖革新。这就将大礼议与嘉靖革新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它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内涵。论断独创，发人深省。再如以往论及明代改革时，主要是讲张居正改革。近年来韦庆远先生讲“隆万大改革”，而本书主张“嘉隆万改革”，中心为嘉靖革新，而张居正改革为“嘉靖革新之余波”。对此全新的观点，田澍教授主要从两方面予以论证。首先是在对嘉靖革新的历史背景、条件生成、进程内容等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嘉靖革新的历史作用：化解了正德时期明朝所面

临的严重统治危机，使明朝重新走上正常发展道路。其次，是对张居正“效法祖制”做了专门考察，指出张居正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借助明神宗的权柄，重新恢复嘉靖革新的部分措施，使其发挥新的作用。从这点出发，完全可以说张居正正是嘉靖革新的真正继承者，其推行的改革亦为嘉靖革新的余波。尽管此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突破了陈见的束缚，引发史学界对明代政治史，特别是嘉靖时期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拓展了明史研究的内涵广度。类似上述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述，本书还有多处，这就充分显示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的著作，值得向学术界推荐。

第三，资料翔实，反复锤炼。本书的资料十分丰富，所列主要参考书达 158 种之多，涉及正史、方志、文集、野史、笔记及今人有关著作等。这就使该书的每一个论断都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令人信服。同时，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间历经九年的反复推敲和不断充实，真可谓“十年磨一剑”。这反映了田澍教授对学术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可贵精神，是对学术界一些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的有力鞭挞。

笔者和田澍教授是在 1993 年西安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结识的。在近十年的交往中，深为田澍教授严谨治学、勇于进取的精神所折服。笔者对嘉靖时期历史也颇有兴趣，曾著《嘉靖皇帝大传》。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成为挚友。现在他的《嘉靖革新研究》一书即将付梓，无限欣喜之余，谨赘数语，作为序言。

2002 年 2 月于南开园

绪 论

一

在明史研究中，许多论著将明代政治视为漆黑一团，认为君主高度集权，且主昏臣弱，吏治腐败。此说乍听似有道理，但思之再三，却无法解释明朝为何能够延续 270 余年的历史原因。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考察明代中叶“天子不见群臣”时曾陷入困惑，提出了明朝“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久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的疑问^①。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赵翼的这一困惑仍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历经太祖、惠帝、成祖等 10 帝 150 余年而到世宗即位之际，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百弊丛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如不改弦更张，除旧布新，明朝难逃崩溃的命运。换言之，在 16 世纪二三十年代，明朝统治者若要延续其统治，唯一的选择就是变革自救。在世宗即位诏书中明确提出：“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②由此可见，此时的明朝统治者已经迫切地感到了革新的必要性。

然而，如何“革故鼎新”，如何确定革新的步伐和程度，革新由谁来领导等诸多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并非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特别是因武宗猝死和无子所带来的皇位异常更迭，使明朝最高权力阶层发生着剧烈的震荡。这一震荡集中反映在“大礼议”

① 《陔余丛考》卷 18《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② 《明世宗实录》卷 1，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

之中。而在这一剧烈的震荡之中，不可能进行有序全面的革新。但是，大礼议孕育着进行全面革新所必需的诸多要素，完成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更替，在明代历史转折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钦定大礼且确立其权威之后，全面而有序的革新活动才得以推行。

嘉靖前期革新前后持续了将近20年之久。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之后，大规模的革新活动基本上结束了。其主要标志有二：一是嘉靖十八年（1539年）前后，作为世宗推行革新所倚信的主要力量——张璁、桂萼等“大礼新贵”已经完全退出了嘉靖政坛，后继诸臣既无强烈的变革之志，又难以与世宗融洽相处，使革新局面难以持续，更谈不上对原有革新的突破；二是此年世宗因革新成效明显，政局稳定，事务减少，权力巩固，试图让太子摄政，自己静养一二年后再“亲政如旧”。但这一想法遭到朝臣的强烈反对，使其未能如愿。从此以后，世宗开始由勤政求治向疏政废事转变，使许多行之有效的革新措施日渐废弛，流于形式，又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统治危机。

但是，这一挽救明朝命运的革新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翻检各类论著，不难发现史学界的主流是把将近半个世纪的嘉靖政治简单地描绘为黑暗腐败，对许多问题缺乏精细研讨，且人云亦云。特别是对大礼议的研究没有摆脱旧史的羁绊，仅仅将其视为争权夺利的一般性事件，并为杨廷和集团的失败而愤愤不平，而把结合“人情”与“义理”解决大礼难题的张璁、桂萼等人斥之为追逐权势的“迎合”之徒。许多论著除了提及杨廷和等人依据世宗即位诏书进行的所谓“新政”而外，论述嘉靖政治便从杨廷和被迫辞职一跃而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以后，刻意描绘嘉靖中后期君臣之间的矛盾、阁臣之间所谓的“混斗”等各类冲突，并对其指责不已。这种对嘉靖政治的过分指责已经变成了一种“时尚”。似乎把嘉靖政治描绘得越黑暗和越腐败，

就越能突出张居正“改革”的亮点。岂不知这一认知模式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嘉靖政治的客观评判，而且也严重地制约着对张居正政治行为特点的公正评价。

大多数研究者把正德时期明朝出现的严重的统治危机看成是“衰世”、“末世”之兆，这是符合史实的。但是，他们却不承认嘉靖前期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革新活动，认为化解这一严重的统治危机不是在嘉靖时期，而是在50多年后的万历初年张居正不足10年执政之时，并对其“改革”大书特书。但是，这种逻辑无法解释自洪武以来特别是宪宗、孝宗和武宗时期愈演愈烈的蠹弊是如何消除或减轻的。如果承认这一严重危机在嘉靖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那么，就得正视嘉靖革新活动。如果不承认嘉靖时期解除统治危机的革新活动，那就无法解释在武宗及其佞臣乱政之后还能出现明世宗长达45年较为稳定统治的政治现象。换言之，按照传统的说法，明朝在正德、嘉靖乃至隆庆三朝全面“黑暗”、“腐败”的政治危机中能够延续将近70年之久，简直是一种神话！

以上完全程式化了的认知模式的致命弱点就在于缺乏对世宗即位之后特别是钦定大礼之后至嘉靖二十年这一时期的理智反思。事实上，如果没有嘉靖革新，明朝积弊不可能等到半个世纪之后让张居正收拾残局。只有对嘉靖革新做一全面的考察，才能客观地认识嘉靖政治的特点和张居正政治行为的特征，才能对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有一清晰的想法。同时，只有对嘉靖至万历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嘉靖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才能改变明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研究格局，有助于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二

在明史研究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正德、嘉靖之际的历史予以独立的审视，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洵和罗辉映两位先生。他们都把重新评价“大礼议”作为认识嘉靖政治的切入点。

1986年，李洵先生在《东北师大学报》第5期上发表了《“大礼议”与明代政治》一文。该文摆脱了传统史学对大礼议的狭隘看法，将其置于“明代社会问题和中國封建社会晚期政治史的总体背景”上来考察，发前人之未发，提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主要有：

1. 世宗即位诏书主要反映了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的政治观点，其目的是恢复正德以前的秩序。但是，由于未能得到世宗及其追随者的完全认可，故其大部分措施未能付诸实践。

2. 大礼议的发生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杨廷和的大礼论调不符合世宗入继的情况，其目的是要把世宗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以便使其能够继承孝宗的政策和执行孝宗的制度。这与世宗即位诏书的政治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而世宗的议礼主张却是为了获得政治独立自主的基础，故既不想做武宗的嗣君，也不想做孝宗的嗣君。为了摆脱某些旧贵族和某些官僚势力的控制，世宗必须争取获得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

3. 钦定大礼之后，世宗与张璁等新进官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世纪以后明代政治中所出现的改革浪潮和各种改革派势力，则与嘉靖时的各

种改革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明代晚期的党争，除去派系权势之争外，核心问题是改革派与贵族大地主之间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李洵先生的这些论点提纲挈领，可成一家之言。如果他在生前就以上观点展开充分论述的话，将会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

罗辉映先生对大礼议的看法与李洵先生基本一致。他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上发表了《论明代“大礼议”》一文，论道：“杨廷和一派人可以而且应该修正其议礼的观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企图凭借权力，制服张、桂诸臣。杨廷和等不允许议礼这支政治力量崛起而损害本集团的利益。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无法避免，斗争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效果，礼法之争含容不了它的全部意义。”接着对张璁等人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予以简要的论述，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提出，对杨廷和依据即位诏书而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不宜评价过高，因为世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局势并未取得根本好转，政治危机依旧十分严重。在《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杨廷和事略考实》一文，进一步论道：世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局面徒有治名，完全是杨廷和一派人的自吹自擂。历史上所说的嘉靖中兴之治，乃是通过大礼议，摧毁了杨廷和腐朽官僚集团后，由张璁、桂萼为首的议礼诸臣肇创的嘉靖前期政治”。此论可谓卓见。如果作者能以这一论点为基础而对各个问题进行重点和系统的研究，那么，明代中后期历史的研究状况就会大大改观。

此外，阎爱民先生在《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发表的《“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一文也是研究大礼议的一篇力作。他突破了传统的“就事论事”、“以礼非礼”的简单方

法，从议礼双方对宗法制与君主制的争论以及这场争论的社会、思想背景等方面予以专门、深入的考察，将大礼议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较高学术研究水平。如他提出的“大礼议实际上是一场上及君主体制，下至宗族制度，有关政治思想、宗法伦理观念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君主制的争论，客观上完成了明末抨击君主专制罪恶思潮的思想准备阶段”等观点极有见地，令人耳目一新。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接下来探讨大礼议与嘉靖革新的关系，而是继承了传统的观点，认为世宗“以改礼制乐为己任”。

三

本书旨在尽可能全面地考察明朝在嘉靖前期由“故”到“新”的转化过程。首先论述了“故”的内涵，即嘉靖之前明朝所面临的严重的统治危机，并以此为考察革新进程及其效果的主要依据。特别是对大礼议本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辨明了大礼议与嘉靖革新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杨廷和集团不能担当革新重任和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能够推动变革的原因予以尽可能详细的考察。同时，在论述革新过程中结合杨廷和集团与革新诸臣政治观点与政治行为的差异，进一步说明前者难以推行革新和后者能够完成一系列变革任务的缘由。

本书揭示了嘉靖革新的显著特点，即在全面清理官僚队伍的基础上推行革新措施。只有如此，才能清除积弊，实现明朝的复兴。而清理官僚队伍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难题，涉及面广，触动许多官僚的个人利益，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世宗与革新诸臣不畏艰险，较为彻底地清理了官僚队伍，重新确立了新的统治秩序。这是贯穿嘉靖革新过程的一条主线。这一革新特点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也是独具特色的。

本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以明代历朝实录等编年史、《明史》、明臣奏疏、明清笔记和明清地方志等为基本史料，参之以其他史书，并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同时，注重“通”与“专”的关系，将嘉靖革新置于有明一代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考察，对嘉靖革新的历史背景、条件生成、进程、内容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究和分析，主要得出了如下结论：

（一）长达三年之久的大礼论战是一次必要而适时的廷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大礼议最终实现了皇权的完全转移，使明朝皇位异常更迭而出现的混乱局面趋于有序，并成功地完成了新兴势力取代旧势力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推行全面革新的历史条件。新君新臣在大礼议中相互支持，成功地解决了史无前例的大礼难题，这就为他们进行比大礼议更为艰难的政治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世宗钦定大礼之后，只有进行革新，才能实现由孝宗—武宗帝系向世宗帝系的真正转变。所以说，大礼议一方面是武宗猝死后实现皇权转移的必然，另一方面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

（二）张璁、桂萼等大礼新贵的崛起和杨廷和集团全面而又迅速的瓦解，是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一个关键环节，标志着长期以来在用人问题上因论资排辈所导致的位居津要的官员行政能力低下和治国乏术的严重弊端开始得到真正的纠正。换言之，大礼议所导致的新旧交替，其本身就是一大变革气象，同时，它又是世宗朝推行进一步革新的新起点。

（三）在明代历史中，张璁、桂萼等人是真正主张进行全面变革的大臣。他们一方面以“祖宗之天下”和“天下之天下”对明代二祖以后诸帝的因循败政行为予以尖锐的批判，开启了对君主专制体制有限批判之先河，并因此确定了嘉靖革新的对象，那就是明代二祖特别是洪武以后的各类弊政。这与杨廷和集团按照惯例仅仅依据世宗即位诏书并以恢复孝宗政治的“新政”是

完全不同的。同时，张、桂等人继续保持着大礼仪中勇于批判和不怕攻击的精神，对各类弊政的源流予以深刻的揭露，并进行了切实有效的革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的革新言行在明代大臣中无人能够比拟。

（四）杨廷和集团之所以在短时期内被摧毁，且未能东山再起，就在于钦定大礼之后世宗与张、桂等人的大力变革使其难以找到卷土重来的借口，明朝因此避免了历史上新旧党争所导致的政局混乱现象。这是嘉靖革新的一大显著特征。

（五）嘉靖革新是明代历史的转折点，它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明代“二祖之制”向世宗“皇祖之制”的转变。但在张、桂等人退出政坛之后，由于世宗满足于革新成就和新帝系的稳固，故日渐消极，不再励精图治和继续推进及完善革新措施了。世宗的怠政废事和由此导致的弊政，又日渐严重。只有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才最大限度地冲破因循之习，全面肯定了世宗与张、桂等人的革新成就，并将其革新措施称为“皇祖之制”，作为自己施政的指南。张居正最大的愿望就在于借助神宗的权柄，倾其所能，重新恢复嘉靖革新的部分措施，使其发挥新的作用。这是张居正“法后王”和“综核名实”思想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真正继承者，嘉靖革新余波直至万历前期。而张居正去世之后所出现的反张浪潮，不仅标志着张居正综核名实政治作风的遽然消失，而且亦昭示着嘉靖革新遗风的最终结束。同时，只有以嘉靖革新为参照，才能洞悉张居正施政的不足。

（六）明代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根本保证在于皇帝勤政理事及其对阁臣的重用。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行政中枢有效地发挥作用。综观明代历史，凡是阁臣选用得力，且受到重用之时，就是明代政治最具活力的时期。而嘉靖前期世宗与张、桂等人密切的关系和所推行的革新则是这一特点的最高表现形式。所以，如何确保皇帝能够勤政理事并突破明太祖禁令而不断地强化内阁

行政职能就显得尤为关键。但在嘉靖前期大规模的革新之后，因世宗的怠政废事和内阁行政职能未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完善，使各种弊政再次生成，并日趋严重。尽管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利用特殊关系一时强化了阁臣与皇帝之间的联系而能有暂时的作为，但他无法在嘉靖前期强化内阁行政职能的基础上实现对内阁体制的进一步变革。故在他死后的反对浪潮中，皇帝愈来愈荒诞，阁臣愈来愈无能，明朝便在反对强化内阁职能的因循僵化中走向灭亡。

四

该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论世宗朝的“革故鼎新”》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蔡美彪老师进行了精心指导。从论文的选题、结构、主题到立论的方法和表述的文风等方面倾注了先生的无数心血。先生诲人不倦、治学谨严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199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不久，先生要我自己初步选定学位论文题目，当我提出研究张居正时，先生认为此题可作，但若仅仅局限于万历初年的历史来研究张居正，很难取得学术上的突破。先生结合自己撰写《中国通史》的深刻体会，认为要研究张居正及其政治行为，首先必须搞清嘉靖前期的历史特点，然后才能谈得上对张居正变革的真正研究，避免张居正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人云亦云的现象。乍听此言，大惑不解。因受传统研究模式的影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嘉靖前期的历史与张居正变革的研究联系起来。在先生的不断启迪下，我便怀着新奇之感和疑虑之心转移了注意力，潜心于嘉靖前期历史的重新认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摘录了100多万字的资料，逐渐地对嘉靖前期的历史有了新的看法，越来越感到先生见解之深透，使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信心和浓厚的兴趣。如

果说本文有何新见解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先生的真知灼见。同时，作为指导小组成员，张德信先生也给予我积极而又热情的帮助。他认为要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其难度较大，要在短时期内完成绝非易事，为此，他提出了许多防止出现偏颇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此外，我的硕士生导师郭厚安教授生前对该论文的撰写也非常关心，他不顾体弱多病，时常以书信的方式传递着他对该问题的诸多宝贵看法，使我获益良多。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在每次面谈之中，也将自己的卓见和盘托出，使我受益匪浅。没有他们的真诚关怀，该论文也难以顺利完成。

在论文评审和答辩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锺翰先生、北京大学教授王天有先生、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显清先生及蔡美彪师、张德信先生等对论文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评议，对论文选题和相关论述给予了肯定，并指出了论文中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为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毕业之后，本人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和充实，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用系列论文的形式，在《文史》、《社会科学战线》、《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二是相关成果参加了第七届至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首届朱元璋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大学创校90周年明清史国际研讨会和教育部中国考试史专题研讨会等，倾听了更多专家的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三是通过科研立项对某些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如甘肃省重点学科项目《大礼仪与嘉靖革新研究》、甘肃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明代嘉隆万官僚体制改革研究》等。其中《大礼仪与嘉靖革新研究》的系列论文于2000年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经过5年多的修改完善，原博士论文内容有了

较大变化，鉴于此，特更名为《嘉靖革新研究》。

尽管该书从选题到杀青将近九年，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因为本人学识和能力有限，故对嘉靖革新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难以做到全面、深刻、客观的认知。相关论述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愿足矣。对书中的错误，真诚企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最后，对蔡美彪师拨冗惠题书名和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延清先生忙里赐序表示最诚挚的谢忱。

田 澍

2002年1月于金城